

新世紀的兩岸關係：武力統一或和平統一？

楊志誠*

摘 要

朝鮮半島兩韓高峰會給予世人極大的鼓舞，而且許多人更寄望這種和解將對處於緊張關係的台海兩岸產生正面的啟示，進而促成兩岸的談判與和解。然而，事實的發展可能不會如一般人所期盼，終究兩岸的情勢不同於兩韓：一來是地緣上，不管是軍事、政治或經濟，台海兩岸與朝鮮半島的兩韓存在著不同的形勢；二來在分裂的因素和背景上，也有很大的差異性。儘管和解可能將是新世紀國際關係的新趨勢，但是分裂後的統一卻必須有賴於形勢條件的創造。

關於統一的問題，其實鄧小平先生早就確立了和平統一的基調，但是由於長期以來，中共對台政策犯了戰略與戰術之間矛盾的錯誤，形成了兩岸關係漸行漸遠的趨勢。在這樣的現實形勢下，使得大陸方面一些領導人開始質疑和平統一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不斷拉高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冀以藉此改變基調，採取武力統一。本文試圖就站在大陸方面的立場，客觀、理性地分別探討，武力統一及和平統一的政策思惟，剖析其利弊得失。

最後，在兩岸同時宣稱追求國家統一（至少陳水扁先生亦公開表達維持國統綱領的基調及國統會的體制）的假設前提下，關於未來的統一模式，目前兩岸所提出的方案，其實不管是一國兩制，或邦聯制，或聯邦制，實質意義上，都具有高度的重疊。但是為何雙方連談判桌都走不上來呢？本文也做了簡單的分析。

* 逢甲大學社會科學教學組專任教授，本文曾發表於中國社科院在杭州主辦的「第九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2000 年 7 月 11 日。

關鍵詞：地緣戰略、戰術、後殖民主義、一國兩制、邦聯制、聯邦制

和解是趨勢，統一靠形勢

世紀末的兩韓高峰會，似乎為東北亞的和平帶來了新契機。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朝鮮半島的和解，對世界局勢的發展當然具有正面的意義，因此世界各主要國家莫不受到鼓舞並給予肯定。人類在經歷半個世紀的對立之後，終究還是會覺醒：對立並無助於豐富生活、維護人性尊嚴及提升文明；和解將逐漸成為新世紀的趨勢。同時，這一事件的另一層涵意是，各國也希望藉此對於一直處於緊張和對立的台海兩岸關係能夠發揮一項啓示的作用。當然，兩岸多多少少也確實受到此一世紀大事的鼓舞，但卻各有所思：台灣方面冀望和解；大陸方面著眼統一。然而，雙方對彼此的期待，卻又都立基於彼此無法接受的前提，終結果，兩岸的關係預計還是會跨越兩韓的啓示、難以突破而回到原點。

其實，對於兩韓關係與兩岸關係的比較，大陸方面的認知應該是比較接近於歷史的事實。兩韓的分裂是受到外國勢力，基於強權本身的國家利益，強行分割所造成（地緣上，朝鮮半島在兩極對抗的體系內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價值），至於歸咎於政、經意識形態或制度的不同，根本上是後來為了正當化分裂的事實，而找出來的理由。對當時整個朝鮮人民來說，他們剛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普遍形成了一種後殖民主義¹及本土化的民族情感，儘管三十八度線猶如銅牆鐵壁般活生生把朝鮮人民分割成兩半，但是朝鮮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民族情感和推行本土化運動的主觀意願是相通而交匯的。所以兩韓推動統一，基本上是有民族情感作為基礎的，雖然條件的創造可能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最主要的條件就是要創造一個形勢，打破造成既有分裂的國際權力結構。根據這個發展及歷史的軌跡來看，兩德統一模式的再發揮，終究還是可以預期的。至於兩岸的分裂，不管是從造成分裂的原因，或是從嗣後的內部發展來看，確是不能與兩韓或兩德的情況等同視之，所以，兩岸關係的發展模式，當然也就無法套用兩德或兩韓的模式。

統一必須從分裂問題著手

根據辯證理論²，統一目標的推動勢必要從分裂問題著手，才有可能得到解決。海峽兩岸的分裂，毫無疑義地是內戰的延伸，只不過，由於台灣海峽的地緣

¹ 後殖民主義的定義是，從被殖民時期到現在，殖民地內的人民，對殖民統治程序塑造的所有文化所採取的反動行為，因此，具體來看，後殖民主義的現象會顯現出反殖民統治社會心理及活動的延續。參見 Vijay Mishra & Bob Hodge, "What is Post-colonialism?" in Patrick Williams &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p.284.

² 蔡伸章譯，Thomas Sowell 著，《馬克思學說導論》，巨流出版社，民國 82 年。

屏障，再加上韓戰的爆發，國民政府成功地把國共內戰的對立與國際兩極對立的體系掛勾，突然之間，將本來屬於一國內部的革命情勢轉化成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形勢，促成了兩岸長期對立、分裂的局面。當然，這種局面也會隨著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轉移而產生變化，但是，由於台灣長期在國際政經體系內參與運作，機能上，有很大程度已經與國際政經體系產生了互賴關係。台灣任何情況的改變，都多少程度會牽動國際體系，尤其在經貿的機能上。換句話說，台灣問題已有很大程度是國際化了，尤其配合新世紀的主流價值逐漸轉移到經濟的議題時，台灣在主客觀條件的互動下，逐漸淡忘了內戰分裂的歷史事實，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當台灣新一代的領導人產生之後，對於內戰，根本未曾體驗的情況下，也難怪他們只知分裂分立，而不知內戰矣！主觀上也自然會把兩德或兩韓的模式套用到兩岸的關係來。

除此之外，兩岸之間還存在一個民族情感分裂的歷史事實。這一個民族情感的分裂，才是兩岸統一缺乏基礎和動力的重要原因，也是兩岸關係無法類比於兩德和兩韓的主要關鍵。李登輝先生說到台灣人的悲哀，雖然是狹隘的、偏頗的地域觀念（其實中國人近一百五十年來何嘗不是很悲哀，這是世界大環境及歷史所造成³，李登輝先生未能用更遠大的眼光去體認，實屬遺憾），但總歸台灣人是有所說的悲哀：遭祖國遺棄，四百年來從來未能當家作主，決定台灣人命運的決策中心，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南京，要嘛就是在東京，甚至還有遠至荷蘭的⁴。儘管如此，這些都還不是割裂民族情感的真正主因，真正割裂台灣人民民族情感的是，二二八事件所產生的效應。其實從 1895 年到 1945 年日本殖民統治的 50 年間，台灣人民是激進抗日的⁵，當時用來抵抗日本殖民主義和推動本土化運動的社會文化，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傳統的文化。這可以從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運動表現出來⁶；另外，最明顯的，可由普受台灣人民膜拜的本土義士廖添丁的抗日故事反映出來（也許只是故事，但卻具體反映了當時人民抗日的情懷，廖添丁是以中國文化所提倡的義理和中國的武功堅決抗日，廖添丁義士的廟就與李登輝先生的家鄉相距不遠，同處台北縣）；其次，也可以從蔣渭水、蔡培火、林呈祿、林獻堂等台灣知識份子所推動的本土化運動看出當時台灣的後殖民主義⁷。這一種民族情感的最具體表現，應該就是台灣光復時，台灣人民歡欣鼓舞迎接蔣介石先生的情景。當時，台灣人民是有很強烈的感情，把大陸的政府（當時

³ 張連康譯，Jonathan D. Spence 著，《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1895~1980》（*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絲路出版社，民國 88 年。

⁴ 石之瑜，《兩岸關係概論》，揚智文化，民國 87 年，第一章第一節，石之瑜把台灣定位為多重文明，講好聽，這是台灣文化的多元性，說難聽，這是台灣的悲慘境遇，必須接受不同文明的衝擊；楊志誠，《中華民國憲政民主的探討》，大中國圖書公司，民國 87 年，第一章。

⁵ 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⁶ 同上註。

⁷ 王曉波，《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帕米爾書店，民國 74 年。

一般的台灣人民沒有人會在乎誰是國民黨、誰是共產黨）當成是自己的祖國，也把它認定是他們長期用來抵抗日本殖民主義的文化源頭，也就是當時後殖民主義的文化內涵。台灣人民經歷了 50 年的日本殖民統治，那裡還能去體會中國內戰的意義。所以當國民政府未能以同胞的情懷，結合當時的本土化，共同治理被日本殖民後的台灣，台灣人民大失所望。接著，在國民政府推行接收統治時，這個被台灣人民認定為大陸來的政府已經失去了台灣人民對它的認同意識，於是它變成了另一個外來的政權。它的統治，在台灣人民看來，是另一種方式的殖民統治，而反對這個新殖民統治的具體行動就是二二八事變。二二八事變的爆發，把這一種反抗意識從此固化了下來。而當二二八事變的平反卻還要台灣人自己來做時，台灣人民這種反大陸政權（在台灣人的眼中，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大陸的政黨，其所成立的政府都是大陸的政權）的情感怎麼可能在短期內消除呢？在二蔣的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人民的後殖民主義及本土化（不管是公開的反對運動或是私下生活方式的排斥）總不能再延用抗日時期的中國文化了。就如在日據時期引用中國清朝的文化一樣，很自然的就會引用前一時期的日據文化，來抗拒新的外來政權，這就是一般所謂的日本皇民化文化的內容。隨後，西方資本主義的引用，帶動了台灣的現代化，也因此與日本皇民化文化結合，形成了近幾年台灣的後殖民主義內容和本土化運動。

事實上，這種民族情感割裂的後殖民主義內容和本土化運動不一定就是要追求台灣的獨立，但在某種程度上欲排斥大陸政權的統治是有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的民意一面倒向支持兩岸關係應維持現況、不統不獨的原因。儘管這種後殖民主義及本土化運動後來被反對人士作為奪取政權的訴求基礎，甚至有意簡化為台獨運動，但終究其間是有不同的意涵。所以，當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反對勢力取得政權之後，不僅未執意貫徹台獨黨綱，甚至開始推動修改台獨黨綱；許多建國黨的領導也紛紛主張解散，這一切多少可以證明，台灣的後殖民主義及本土化運動並不完全等同於台獨，也不必然與中國的統一具有絕對性的矛盾和衝突。然而，這種不統不獨的現況，也正是將要選擇未來是走向統或獨的十字路口形勢。不管是想要解決台灣問題或是統一問題，如果偏離這一個主客觀的歷史事實，將只有使得兩岸的關係更為惡化，甚至可能會連帶牽動整個中國的現代化發展。

其實，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殞落，雖然國共內戰的情勢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但是半世紀以來一直存在排斥大陸政權統治的後殖民主義及本土化運動終歸有了結果。至少，在感覺上，讓台灣人民可以自主決定如何面對「一個中國」的問題。這對兩岸關係來說，未嘗不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局面，對大陸來說，應該也是一個比較可以影響和掌控的局面。

綜前所述，從族群的情感來說，台灣其實有很大的理由追求獨立，但台灣人民並沒有真正的想追求獨立；從歷史的宿命來看，台灣其實也有幾次機會可以或

能夠真正的獨立，但都沒有獨立：第一次應該是馬關條約後的台灣民主國，當時唐景崧如果不宣示「奉大清為正朔」⁸，迫使美國的政策急轉彎，很可能會在美國的支持下（當時美國試圖幫助台灣獨立，有利於以台灣為跳板推動其中國政策），取得民族國家的地位；其次是韓戰爆發以後，在國際兩極化體系的運作下，當時也有人主張應藉此宣告台灣獨立，尤其是在八二三砲戰後，當中共的武力攤牌未能促成統一時，當然就是宣告獨立的好時機，並可能藉此在美國的支持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最後是在 1970 年聯合國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時，透過美國當時的規劃，也有很好的機會造就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實⁹。這些機會基本上有一個共同的條件，就是中國國力的相對衰弱，國際社會傾向支持中國的分裂。然而在當前中國國力快速竄升，國際社會認同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之際，台獨的歷史宿命已注定失敗，在兩岸政經實力相對消長的趨勢下，台海兩岸終將統一的形勢已經漸漸形成。這種情勢的發展，除非爆發國際社會的結構性大變動，否則應該不太能夠逆轉。這種普遍的認知，不僅是李光耀先生在今年 6 月北京舉辦的「二十一世紀論壇」中已明確揭示，就連陳水扁先生及民進黨菁英也都承認，台灣終究必須面對「一個中國」的問題。其實大勢已定，站在大陸的立場，接下來所要嚴肅考慮的問題應該是，如何統一和以何種模式統一：關於如何統一，不外乎是，武力統一或和平統一；而至於以何種模式統一，也不外乎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或「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武力統一的政策思惟

關於兩岸如何統一的問題，暫時撇開鄧小平先生生前所定下的和平統一基調不談（事實上，最近大陸方面已有人對這個基調的有效性產生懷疑，主張早打、大打的武力統一方式），要想「真正」解決統一的問題，勢必要能同時解決上述所提到的台灣問題國際化及台灣內部後殖民主義情感的問題，否則就算形式上解決了台灣問題，難免又會衍生出中國問題，這不僅無助於中國的真正統一，恐怕還可能遭致國際社會的政經封鎖、進而衍生內部分裂的混亂。不管怎麼說，一個國家實在應該採理性的思考，來決定其國家政策的方針，以下就分別來探討武力統一及和平統一的政策思惟。

站在中國大陸的立場來說，如果以武力的方式能夠同時解決台灣問題國際化及台灣內部後殖民主義情感的話，當然應該毫不猶豫地採取武力統一；但是如果採取武力不能有助於真正的統一，那必然就要承擔不必要承擔的代價，甚至陷自己於危境，那麼就不如以武力的威懾效應為架構，阻遏及排除危害統一的因素，

⁸ 在〈唐景崧就任大總統宣言〉中明示：「…惟台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須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蕃」，見王曉波，《台胞抗日文獻選編》，頁 15。

⁹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Boston:Little, Brown, 1979).

在攻心和伐謀的戰略行動配合下，達到最成功的勝利。這就是兵法上開宗明義所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以及「攻心爲上，其次伐謀，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意涵。

首先來看使用武力能不能解決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問題。這個問題牽涉到使用武力能不能完全排除美國和日本的高度關切、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關切。答案其實非常明顯，基於美國在下世紀全球戰略的考量¹⁰、美日安保體制機能有效性的維護¹¹及國際政經體系的正常運作¹²，儘管目前各主要國家都有不願輕易使用武力的共識，甚至也都曾公開宣稱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但在各自國家利益的考量下，不見得能夠完全容忍台海的兵戎相見。也許美國在其既定政策下，不願以武力直接介入，但是除了武力直接介入的手段之外，可能將會盡一切所能，包括聯合日本啓動美日安保體制，全力支持台灣打這一場戰爭。

當然，吾人願意相信，大陸方面是決不打沒有把握的戰爭，但是說實在話，台灣也不見得是省油的燈，尤其在美日的積極支援下，這一場戰爭雖然名譽上是一國內部的內戰性質，但實質上必然是一場國與國之間的慘烈戰爭。吾人也願意大膽的假設，大陸方面慘烈地打贏了這一場統一的聖戰，但結果會是什麼景象呢？畢竟「一師之舉，十年之蓄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兩岸戰端一旦啓動，還談什麼經濟建設呢？過去美、蘇五十年的冷戰，才有中國的崛起；未來如果爆發兩岸熱戰，終使日本抬頭。

短期來說，美日當然希望台海和平，以有利於其經濟發展；長期來看，兩岸戰端一旦啓動，美日何嘗不是樂見其事。以美國在下一世紀的全球戰略來說，犧牲一個小台灣，使得歐亞大陸不再存在強大的競爭對手，消除了「中國威脅論」的可能性，換取世界霸權的鞏固，亦未嘗不是一件有利的事¹³。更何況，以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由於台灣地緣的特殊性，只要中國國力相對轉弱，下一次要再促成台灣真正的獨立，亦非完全不可能，又何必急於一時呢？終究可以等著瞧！如果瞭解美國外交政策規劃及運作的人，應該能夠預期，美國中央情報局可能已經在規劃台灣流亡政府的可能性了¹⁴。所以說，對於兩岸的戰爭，美國並不是沒

¹⁰ 楊志誠，〈從柯江互訪看跨世紀的兩岸關係〉，《海峽評論》，第 90 期，民國 87 年 6 月，頁 19～23。

¹¹ Susanne Feske,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Out of Date or Highly Fashionable,"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6, No.2, 1997, p.434;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http://www.cc.ntu.tw/~yang/paper~11.htm>; Steve Chan, "East Asian Dynamism," in Suisheng Zhao, *Power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169.

¹² 張炳清、韓永學編，《大賭局：冷戰後地緣政治格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5～24。

¹³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¹⁴ 美國外交政策的規劃最少都會前瞻 30 年以上，1992 年的美、伊戰爭，事實上早在越戰戰敗之後即已開始準備，參見 Toffler 夫婦所著《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不僅美國政府如此，

有預期的準備，這一點大陸方面應該要瞭解，否則將會贏了戰爭，卻輸了未來，很可能得不償失。

其次，關於分裂的民族情感部分，一旦雙方兵戎相見，這種二而一的民族情感，立即轉變成二個獨立的、互不相容、彼此對立仇視的種族意識。就算被統一，台灣人民的後殖民主義情結不僅不會隨著戰爭的結束而被消除，恐怕還會分頭從明的及暗的層面擴大其規模。對台灣而言，這種情勢無異是將兩個獨立政體的對抗型態，轉化成內部革命形勢的鬥爭，再配合流亡政權聯合陣線的對抗，長期來看，或許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很顯然地，武力只能統一形式，並無法統一民族的情感，也就無法達成實質的統一，以有利於中國未來的整體發展。

然而，分析事情也不能完全單從一面去估算，也應該退一萬步來推算，假定大陸方面推動武力統一，未能如願，搞到最後也跟懲越戰爭一樣，只能給台灣一個懲戒。在這種情況下，台灣難道會謹記懲戒而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嗎？其實答案應該也很明顯。一旦大陸方面動武，但卻未能有效促成統一，台灣將會宣告獨立，預料屆時也會取得國際上更多的支持和奧援。或許會有很多人認為，這種結果是台灣的一大勝利，但其實這種情況也是一樣，對台灣而言，可能是贏了戰爭，失去了未來。嚴格說起來，兩岸這種形勢的戰爭，是一場永遠沒有勝利的戰爭。就算經歷戰爭後台灣得以順利宣告獨立，必然也會激起大陸十三億人民的強烈仇恨，幾乎會把一百多年來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新仇舊恨，全都反射於台灣身上。這種情況下，台海兩岸勢必長期臨戰、全力進行軍備競賽，那裡還會有經濟建設的可能？這樣一來，下個世紀怎麼可能會是中國人的世紀呢？

綜合以上的分析，武力或許可以達到形式的統一，但其真正的結果卻是實質的分裂。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那麼就讓我們暫時先回到七世紀的隋唐時期。以七世紀的陸權時代來看，對於中國的地緣戰略及國家發展上，中國的東北和朝鮮半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如今天的台灣，在海權時代，對於中國的地緣戰略及海權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樣。當時的高麗就佔有這塊戰略要地，這對於中國天朝的政權來說，無異是一大威脅，但其實真正威脅到的，應該只是天朝的天威，而不是政權的生存。但是不管是隋煬帝或是唐太宗，都無法忍受一個不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高麗王國，就在一貫的大一統思惟的影響下都毅然出兵，思以武力統一，然而二者卻都雙雙受到重挫：前者因而失去江山，後者也幾乎耗盡國力，危及帝業。而高麗最後的馴服及被統一，終究是在「王道」的方式下達成¹⁵，換句話說，就是透過和平的手段達成統一。以下就來探討兩岸和平統一的問題。

就連美國的企業也是如此，如美國微軟公司，其開發計畫都至少前瞻十年，方能具有世界性的競爭力。

¹⁵ 李敖，《北京法源寺》，李敖出版社，民國 89 年，第一章。

和平統一的政策思惟

武力的妙用就在於未使用前所發揮的威懾效應，武力一旦啓動，威懾效應立即消失，相對的戰略空間也隨之大幅縮減。威懾效應的巧妙運用，就是兵法上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乃戰略的上之上者也。然而，威懾效應必須立基於二個要件：一者為相對優勢的兵力部署，二者為明確的用兵意願，但卻不能攤牌。另外，威懾效應屬於一種靜態的壓力狀態，本身並不能自我運作以達成戰爭的目的，所以就必須配合其他的戰略行動，才能順利達成所要追求的目標，所以兵法提出了攻心和伐謀的戰略行動。

過去美、蘇兩國嚴厲對峙將近半個世紀，不僅積極追求核武優勢，而且在傳統武力上也加速整建，總認為，在核武保證相互毀滅的嚇阻架構下，適度使用傳統武力的有限戰爭，將是決定最後勝敗的關鍵。但是歷史的事實證明，最後決定勝敗的戰場，卻是在經濟的領域。經過了這樣的經驗，美國重新定義其國家利益的內容，同時對於過去的思考，認為軍事是達成國家目標最有效的手段，也做了修正。認定在未來的新世紀中，決定國家權力的內容應該分為軍事手段的硬權力（hard power）以及非軍事手段的軟權力（soft power），而軟權力的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的手段¹⁶。這種軟權力的運用，事實上就是等於我國兵法上所說的攻心、伐謀之略。美國經歷了冷戰的勝利之後，更能深切體認不戰而屈人之兵、全面勝利的實質意義。

基於相同的戰爭智慧，也讓我們更能體會到鄧小平先生生前所確立和平統一基調的正確性：一方面宣告不放棄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又同時宣示要以和平的「手段」促成統一。具體一點的說，就是要在武力的威懾效應之下，採取攻心和伐謀的和平手段，達成統一的目標。所以，鄧小平先生確立了經濟建設的國家發展方針，認為只要中國的經濟建設順利完成，財大自然可以氣粗，台灣問題就可以解決。然而，這二十幾年的經濟建設已呈現了初步的成果，為什麼台灣問題並不見得有相應的改善呢？

所謂和平統一，簡單的說，就是以和平的手段，達成統一的目標。這裡所強調的是，和平的「手段」，既然是手段，就不會是自然的過程，而是施予某種壓力的過程，而這種壓力，一般的認知是，來自於非軍事武力的運作，所以才稱之為和平的手段。如果只從形式上來看，似乎一般都認為是透過談判的程序，來達成統一的目標。然而事實上，任何兩個對立的獨立個體，至少要有一方認知到「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才有可能走上談判桌，進而達成協議。而這個「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在和平的意涵上，應該就是中國兵法上所說的攻心和

¹⁶ Joseph S. Nye, Jr.,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4, July/August 1999, pp. 22~35.

伐謀，更具體一點的說，就是美國所說的軟權力，即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則形成於彼此不平衡的依賴。

雖然兩岸的統一不能等同於兩德和兩韓的模式，但若要透過和平的手段達成統一，當中必須形成推向談判和促成妥協的動力應該是一樣的，只不過，該動力的著力點及運作對象的內容有別而已。當東德的經濟陷入困境，而又不能在國際社會內的經濟體系得到紓解時，西德的經濟優勢及政治善意，自然而然就變成了東德經濟危機的救星，於是就形成了「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這種「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發揮效力否定了何內克政權僵硬的兩德政策，促動了兩德的統一¹⁷。同樣的道理，當北韓面臨糧食危機的狀況，卻又無法在國際社會中取得緩和危機的支援時，「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自然就會產生，兩韓的和解氣氛也因而形成，至於是否會從此發展而邁向統一，則端視此一「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將如何發展而定。綜觀兩岸、兩德及兩韓的分裂狀態，當中至少有一共通之處，就是對立的雙方都具有相同的血緣、歷史、語言、風俗習慣和文化，所以在文化方面的軟權力不易形成，只能作為政治及經濟軟權力認知上的輔助功能。所以「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概只能從政治和經濟的層面來規劃。

回顧過去這二十幾年兩岸互動的情形，總的來看，大陸對台政策基本上是犯了戰略與戰術之間互不協調、甚至產生矛盾的錯誤。鄧小平先生認定只要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功，台灣問題自然可以解決。這個戰略方針絕對是正確的，只不過，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功，跟台灣又有什麼直接關係，為什麼台灣問題自然可以解決呢？鄧小平先生可能認為，中國經濟一旦起飛，以一個繁榮的大經濟體面對台灣一個小經濟體，而且以台灣經濟資源匱乏的條件下，還能不因為彼此不平衡的經濟依賴而迫使台灣就範完成統一嗎？但是這一切必須建立在一項前提，即台灣不能脫離中國的前提，所以鄧小平先生一再聲明，不放棄武力的原則，主要就是要以武力的威懾效應，維繫兩岸之間的一個中國架構。整體而言，這個戰略方針是正確的，但是，憑什麼中國經濟建設成功台灣就會自然被統一呢？這一個問題的答案，就決定於採取什麼樣的戰術，去落實這項既定的戰略了。

至於所採取的戰術，應該要能夠對台灣形成「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而且這個壓力必須大到超過「台灣問題國際化及後殖民主義情結」的效應，如此才能既在和平的狀態下，又能推動統一。但是過去這二十幾年，中共所採取的戰術，證明並不能達成這項任務。中共的對台政策，基本上還是不離「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基調，一方面透過兩岸的經濟交流，讓台灣的經濟逐年加深對大陸的依賴，以造成兩岸之間經濟依賴的高度傾斜，形成經濟性的軟權力，然後促成以民間包圍官方的形勢；另一方面提供優惠條件給台商，進一步建立經濟性的統

¹⁷ 胡祖慶，《後冷戰時期東歐民族主義問題解析》，政大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84 年。

一戰線，轉移入台灣內部，把兩岸之間的對峙型態轉成新的革命形勢。理論上看來，似乎應該是相當合理和有效，但實際上並未發揮預期的效應，其理何在？

首先，如欲以民逼官，就應該探討，在什麼情況下，民才會逼官，然後據此創造條件，才能達到目的。根據歷史的經驗，民會逼官，主要是在民不聊生的狀況下，才有可能¹⁸；另外一種情況是，人民在飽暖思淫慾的情況下亂政。前者的情況最為普遍，後者則屬特殊情形，如羅馬帝國之淪亡、唐朝之覆亡。所以如果中共想以民逼官，首先就要在台灣內部創造條件。以過去兩岸的相對經濟力而言，顯然，大陸方面並無法造就台灣人民飽暖思淫慾的條件，較可行的條件應該是促成台灣的經濟困境，造成以民逼官的形勢，然後再透過同胞愛的表達，展現政治誠意（政治性軟權力的運用），當可以在台灣內部，跨越後殖民主義及本土化情結，形成「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當然，要促成台灣經濟困境的條件，也不是一蹴可及的，必須從國際的政經體系下手¹⁹，也就是剛剛所提到的，超越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效應。其實平心而論，大陸經歷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建設，所造就的條件，對國際政經體系已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再加上過去台灣在國家發展政策方面犯了許多錯誤，如果不是大陸方面的戰術錯誤，今天的兩岸關係可能不是當前的這種景象了。

其次是關於以商圍政的問題。這一項戰術的思考，根本違反了中國長期以來的經商文化，所以更不可能產生效果。中國的經商文化是必須尋求官商勾結，取得有利的、專有的市場經營權，所以素來商人對於政治都必須保留一定程度的柔順彈性²⁰，甚至對於政治都有「最好不碰觸」的戒心。更重要的是，不管在外地的經商如何成功，台灣終究是根本，失去了根本，還能有什麼呢？台灣既然是根本，在主觀的情感取捨上，就不太可能完全割捨而去圍其政了；在客觀的理性選擇上，基於台灣內部市場的考量，面對台灣的後殖民主義情感及本土化的政治主流情勢，商人更不敢去碰觸，這樣的話，商又如何圍政呢？

自 1980 年代末期，美國因為在雙重赤字的財政壓力下，採取了新保護主義，牽動了整個國際經濟體系，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台灣的經濟。因此，也迫使台灣跨越政治的障礙，藉口人道理由，開啓了兩岸的交流。十幾年下來，大陸方面宣稱，台灣從大陸賺取了大約一千億美金，事實大概也是如此，但又如何呢？

當然，這一千億美金對維持台灣的經濟繁榮，確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大陸也一直以為，這樣的善意，應該足夠跨越台灣的後殖民主義情結；台灣會因為感念而上談判桌，順利進行和平統一的談判。所以，大陸方面對於祖國統一，一直冀希望於台灣人民。然而，由於台灣的歷史特殊，在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總認為，

¹⁸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¹⁹ 可以從主觀性政經實力的擴增及兩岸相對實力差距的擴大著手規劃，篇幅所限，不在本文詳述規劃案。

²⁰ 同註 17。

後殖民主義情結及本土化一直沒有落實，自主的意願仍然非常強烈，而這個意願往往又隨著主觀條件的提升而增強（只有富人才會不斷的對政治權力產生慾望，窮人那會談什麼尊嚴呢？）。所以當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與品質能夠維持的狀況下，追求政治自主和維護國家尊嚴的意志力就更為堅強，那裡還會想到兩岸的統一？更激烈的人，甚至可能還會認為條件成熟，而堅持應該獨立。

所以，當對台政策推動「經濟拉攏，政治施壓」時，其效應剛好與預期的背道而馳。現實來看，生活愈舒適，追求政治自主的慾望當然會愈高，結果反而要面對大陸方面政治的壓力，當然會高度不滿，認定大陸方面霸道。於是，大陸方面更為憤怒，再繼續推行政治施壓，甚至更配合軍事威脅。這種惡性循環的情況，只會激起台灣人民更強烈的後殖民主義情緒，甚至不惜以死相搏；這種情緒，從台灣兩次總統大選的情況，可以很明顯地得到證明。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大陸方面採取的是，像西德的政策「經濟緊縮，政治拉攏」的話，可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所以，我們幾乎可以得出結論說，並不是和平統一的基調不可行，而是對台政策的戰術錯誤，才會造成今天兩岸關係的僵局。將來如果能夠調整相關的戰術作為，針對前面所提出的「分裂問題」，妥善規劃攻心與伐謀之策，和平統一將可期也。

和平統一的模式：一國兩制、邦聯制或聯邦制

當有了和平統一的形勢之後，在「必須談判及必須妥協的壓力」下，雙方走上談判桌，接下來所要面對的問題，將是在怎麼樣的模式或形式下統一。本來這個問題早在 1980 年代初，鄧小平先生就已經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和主張。平心而論，這個構想或主張基本上符合了中國「王道」文化的精神。所謂以王道治天下，就是允許並尊重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制度，就如前面所提到的，雖然西藏、蒙古、高麗、大理、安南、回紇等都曾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歷代的天朝並沒有任命官員到當地擔任領導人，而是尊重它們各自的政治制度。當然，既然制度上可以允許兩制，現實上自然就會形成多制的局面，譬如，允許西藏與天朝兩制並存，當然制度上也必須允許蒙古與天朝兩制並存，而同時西藏與蒙古之間當然也應該是兩制並存囉！終結果，當然就形成一國多制了。這一種一國多制的國家結構，從西方的體制型態來看，其實就是「邦聯制」或「聯邦制」。所以說，關於「一國兩制」，鄧小平先生所創造的只是它的名稱，而不是它的體制。

但是，為什麼大陸方面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會遭到台灣方面強烈的排斥呢？這當中可能有二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鄧小平先生提出這個構想時，主觀意念上是想同時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的統一問題，但是在時空及處理對象上，香港和澳門顯然比較迫切，所以一國兩制的內容，比較多的層面是從港、澳的情況出發的。一來，在有形的空間觀念上，港、澳終究是大陸陸地的延伸，不管是地緣

政治或地緣經濟上，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及價值；二來，針對港、澳問題，中國所要協商談判的對象是，十九世紀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該二地的收回，象徵著中國被殖民歷史的結束。因此，爲了徹底結束中國領土的殖民統治，鄧小平先生當然必須主張，先和平統一，把該二地的主權及治權完全收回，沒有絲毫外國統治的陰影之後，再給予一國兩制的地位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保證，於是就訂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說穿了，不就是「聯邦制」嗎？中央擁有國防權及大部分的外交權與貨幣權，所以鄧小平先生堅持，人民解放軍必須取代英國及葡萄牙軍隊，進駐港、澳地區。其實這種一國兩制的國家型態比聯邦制的體制還要鬆散：試問美國會允許加州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或允許加州政府發行加州幣嗎？

然而，儘管鄧小平先生對港、澳的回歸思考已經很周全，但是由於台灣的主客觀情況與港、澳的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是無法完全套用的。首先，兩岸的分裂是內戰所造成，台灣是由中華民國所統治，而不是由外國的殖民政府所統治，而且中華民國政府依然擁有中國傳承的正統地位，其憲法（中共也共同參與制定）所規範的疆域一直是擁有台、澎、金、馬的主權。因此，台灣問題的解決，大陸方面所要協商談判的對象，是具有對等身份의 交戰對手，而不是外國政府。憑什麼可以不經決戰而收回台、澎、金、馬的主權和治權呢？而且內戰的特性不同於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既有政府一旦失去對占有地的主權和治權，即等於滅亡。其次，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上來看，台灣基本上是一個完整的、自主性很高的政經實體，尤其有台灣海峽的自然屏障及擁有國際地緣戰略上的重大價值，她本身就擁有有效的國防能力，不像港、澳本身根本沒有自己的國防力量，必須完全依賴於英國和葡萄牙的軍隊。所以，很顯然地，港、澳的統一模式並不能適用於台灣，這是大陸方面應該瞭解的。事實上，隨著港、澳的回歸，大陸方面大概也已經認知到這一個事實，因此也一再聲明，將來台灣的一國兩制不同於港、澳模式，中共將不派一兵一卒或任何官員到台灣，尊重台灣的既有體制²¹。如果是如此的話，那麼兩岸的互動型態，就不可能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而應該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亦即在和平、未武力攤牌的程序上，先承認和平共存的兩制，彼此有了共識後（或許是經過自然的程序，或許是在和平手段的壓力程序下達成），再完成統一。

從實質面來看，這種「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國家型態與邦聯體制的內容已經非常相近，甚至比邦聯制還鬆散。雖然是在一個中國的體制內，但至少兩岸之間，還維持著兩個互不干預的政府，而且也沒有如歐洲聯盟的情形，再另外組成一個代表邦聯的權威政府。最近台灣方面，從陳水扁先生以降，朝野各界有很

²¹ 葉劍英，〈人大委員長葉劍英九條談話〉；鄧小平，〈鄧小平談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人民日報》，1983年7月30日；江澤民，〈江澤民主席春節前夕八點談話〉，《人民日報》，1995年2月1日。

多人都認為，兩岸之間可以針對邦聯體制加以討論。但是，為什麼兩岸之間，對彼此所提出的方案，好像根本連談判的機會都沒有呢？這同時也是台灣方面為什麼排拒一國兩制的第二個原因。

針對台灣問題，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確實是表現了高度的智慧，但是仍然不是完整的智慧。終究這個構想或主張是必須透過談判來達成的，而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要成為統一後的成果，那麼它就必須是未來兩岸談判協商之後的協議，而不是開價。一旦把它公開宣揚，一國兩制就變成了開價的價碼，除非是兵臨城下的招降談判，否則就不可能是協議價位。而且，如果大陸方面開價之後，不容許台灣方面討價還價，那麼大陸方面就顯得太過於強勢，甚至會被國際社會認定太霸道，那有開價不容許對方討價還價的道理呢？；另一方面在台灣方面的感覺上，這種方式的談判，確實有損尊嚴，沒有任何領導人及談判代表敢接受。這種情況，就如美國早期勞資糾紛的談判一樣，當時資方認為，勞方的知識及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差，因此在談判之前就先經過詳細的估算，把所有可以讓步的空間全部加以考慮，最後提出一個相當合理的價位。然後一上談判桌就表明，這個價位完全考慮了勞方的最大利益及資方最大的讓步空間，不可能再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客觀來說，從實質的利益考量，資方所說的，儘管是事實，但經驗證明，當時的談判幾乎都無法達成協議，直到資方從此改變這種談判的方式，勞資談判才開始步上正軌²²。

李登輝先生大概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眼見 1998 年 10 月辜振甫先生到大陸參訪，提出了「一個分立的中國」的立場時，感到情況有點失控。一個分立的中國終究是一個中國，深恐就此立場，雙方如果再進一步討價還價後，可能很快就會邁入和平統一的進程。於是，李登輝先生在未經深思熟慮下，立即提出「兩國論」作為重新的開價。然而，推行這一項舉動的時機不對，因而明顯地犯了二項錯誤：一是談判的誠信問題，李登輝先生把對外的談判，當成他領導體系內的協商，可以不必太考慮誠信問題，結果是讓國際社會批判他為麻煩製造者；二是開價的價位超離現實太遠，50 元的東西，竟然開價 500 元，尤其當一般市場行情認定頂多 100 元的情況下，立即被判定絕無談判誠意。但不管怎麼說，至少他已經知道開價與協議價位是不能等同視之，所以他才說，兩國論是給未來的執政者，在處理兩岸關係時，有比較大的折衝空間。

最後，兩岸都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非常重視名正而言順，所以老是會在名稱上打轉。另外就是，雙方都極好面子，覺得讓步似乎是很丟臉的事，不能做，因而無形中亦成為兩岸談判僵局的潛在因素。所以，實質意義上，儘管對大陸方面而言，聯邦制的條件比「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寬鬆；邦聯制的條件也比「一

²²Roy J. Lewick, Joseph A. Litterer, John W. Minton & David M. Saunders, *Negotiation, 2nd edition* (Burr Ridge, Illinois ; Boston, Massachusetts ; Sydney, Australia: Richard D. Irwin, Inc., 1994), Chapter 3.

國兩制，和平統一」要寬鬆，但是只要談到邦聯或聯邦，大陸方面立即一概排斥；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台灣方面，本來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其實也不過是維持現況的就地合法化罷了，否則美國也不會樂觀其成）應該是比接受邦聯制（大英國協，難道可以不在一個英國原則下規範彼此的關係；美利堅邦聯也是在一個美國原則下訂立邦聯條款）的情況，更合乎台灣的利益，但是台灣方面抵死不accept「一個中國原則」，卻要大談邦聯。就這樣一來一往，兩岸的對峙，陷入了緊張狀態。本來雙方立場應該是存在著交集的，結果是連上談判桌的機會都沒有。這下也把美國看傻了，老美已有一點搞不清，兩岸的癥結到底在那兒，就算積極規劃第二、第三管道，似乎也無濟於事。看來，鄧小平先生生前留下來的這一個不完整的智慧，是應該由這一代來補足，才能真正完成和平統一。對鄧小平先生而言，這也許就是缺陷美吧！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Next Century: War-oriented Reunification or Peaceful Reunification

*Chih-Cheng Yang**

Abstract

The summit meeting of two regime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inspired people in the world; many people even anticipate that the event can help to alleviate the unease relations betwee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owever, geographically and historically the situation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Despite the fact that conciliation would be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ext century, reunification of a divided nation must depend on a conducive situation and conditions created for unification.

On the issue of Chinese reunification, Deng Xiaoping had set resolution and declared that it should be implemented by peaceful means. Then since the PRC Taiwan policy makes mistakes due to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s strategy and its tactics,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deteriorated; that makes the Chinese leaders suspect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policy and continuously escalate the rivalry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paper tries to be objective and rational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cost-benefits of war-oriented reunification policy to that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policy from the PRC point of view. In addition, the paper would also try to seek the reason why the both

* Professor, Section for Social Sciences Teaching, Feng Chia University.

sides are not willing to negotiate even though there is yielding space between the “one state, two systems” proposed by China and confederation system acceptable by Taiwan.

Keywords: geostrategy, tactics, post-colonialism, “one state, two systems”, confederate, federalism